



新世纪博士文库

马克思主义 及其中国语境

张琳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永恒的事业 永恒的课题^①

——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代序)

庄福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尤其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与理论事业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一项永恒的事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成果,也是一项说不尽、做不完的永恒课题。

近百年艰难而壮丽的历程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历了两个层次的艰难探索。

第一个层次是从东西方各种救国救民的思潮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能够救中国?因为它给中国人民送来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送来了科学地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有了崭新的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它通过十月革命和俄国的经验,送来了俄国人所走的道路,即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进入了有千百万工农大众参加的政治斗争,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

^① 谨以此文作为张琳博士新著的序言。

新。更深的层次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逐步认识到真正管用的、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之途的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或视马克思为“先哲”的神秘主义。

第二个层次的探索，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艰难历程。如果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探索的主体开始，迄今也有80年的历史了。80年的岁月，在马克思主义150年的全部历史中占有半数以上，其发展的规模，其广度和深度，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概而言之，80年的探索都是围绕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而展开的。前28年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并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有力地论证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为马克思主义这一独创性贡献作出了历史的结论；随后7年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条道路为中国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发展繁荣，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和伟大力量；从1956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2年，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甚至还走过一段全局性“左”倾严重错误的道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在极其艰难、付出沉重代价的条件下进行的，而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和新道路，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经历长期改革开放的实践，通过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的概括和总结，逐步确立和完善起来的，从找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开辟，不断前进，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但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20年，经受了来自政治上、经济上和自然界的各种风险与考验，为社会主义在世纪交替中赢得了新胜利，也为中国人民在已经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上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问题，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今天，社会主义事业有今天，都是找到和开辟了上述三条道路的结果，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旗帜下独立探索的胜利成果。

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看，当时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先例和经验，都是根据欧洲情况提出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是从城市暴动和街头巷战而引发出来的，也都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和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导致迅速失败；十月革命的成功，只是提供了在俄国具体情况下，由无产阶级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一举夺得国家政权的欧洲模式。这些经验教训都不是中国革命可以照抄照搬、直接模仿的，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有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没有遇到过的，也不可能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来解决的，只有依靠中国人民，根据中国情况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解决。曾经在中国党内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意孤行地在中心城市组织武装暴动，去迎接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革命高潮”，主观盲目地驱使劣势的红军同强大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决战”，梦想把欧洲革命的模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大地上来，其结果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然而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这里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有一个如何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具体情况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善于和上述错误倾向作斗争，善于思考和学习者，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党，才会走向成熟。事实正如邓小平同志概括的那样：“关于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适用于中国。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

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①这个原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是他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提炼与概括。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探索的结果，是坚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相结合的结果，从而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既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又在一个几亿人口、生产落后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创造了符合中国特点的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为艰巨。它不仅经历了更长的时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从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才提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把这条道路的探索以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起点，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应当说探索之初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探索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失误，工作上的反复曲折以至倒退延续了整整20年，随后才出现转机，出现了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标志的历史的伟大转折。22年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也是极为深刻的，从理论上说，主要还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演变和发展的。

在《论十大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进的。从党的八大确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到毛泽东同志随后提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等等，既是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有很大的创造性。这些都为“文革”前10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骨干，指明了方向。但是，探索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状况由于认识不足而产生的偏差，由于经验不足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特别由于主要负责人在胜利面前滋生起来的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的情绪，不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严重，而且使错误往往反复出现得不到彻底纠正，甚至在纠偏工作取得成就、国民经济重现生机的情况下，也难以避免一些别有用心野心家利用这些错误，而导致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场悲剧，就在它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抱着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却陷入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局。从理论上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场悲剧，必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深入思考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这一重大问题，当首推身邓小平同志。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深知要把这场10年内乱所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必须从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中清理出一个头绪，抓住其中心环节，才能有“牵一发以动全身”的效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中，首先抓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被颠倒的各种是非标准中突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神化领袖、个

人迷信的长期影响中率先恢复实践的权威，从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从各方面都要整顿中把党的整顿作为一切整顿的核心，从全面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中，认定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在历史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非凡智慧和胆略，充分证明他不愧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领导人，是继毛泽东之后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道路、新成就的杰出代表。

正如民主革命时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以后，革命的发展就势如破竹地取得全国的胜利，而社会主义在长期曲折坎坷的道路上终于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建设的进程也就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和规模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是以社会主义事业重新振兴的姿态跨入21世纪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这就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重而道远

新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深刻变化、而且远未最后定型的新的百年。回顾历史，瞻望未来，开创新百年的辉煌，仍然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需要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同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同当代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特点相结合。

^①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

新世纪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预料的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种转变的时代。新世纪的中国生存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之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前进和发展的大背景、大氛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不应忽视这一背景和氛围，就必须紧密结合世界历史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来思考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要看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必然趋势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敏锐地预感到资本力图创造世界市场，摧毁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从而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他们认为这一不可遏止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了。^①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趋势，无产阶级的态度不是阻止它，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年（恩格斯语）^②，使历史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彼此隔绝的时代，而认为只有在交换具有世界性质的情况下，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会保存下来，有所发展，才不会像隔绝状态下那样，每一种发明都必须重新开始。^③这说明世界历史的存在也是生产力得以继续发展的保障。同时，马克思主义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它本身就是同历史向世界历史演变相平行的，是在转向世界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总是在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文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环境和条件。可见，不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或者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从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大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3页，第46卷（上），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背景、大氛围，深入认识和研究当代的这一背景和氛围，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置于这种环境和条件之中，是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的前提和出发点。

从世界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正是在新世纪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唯物史观总是顺应历史的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推动社会前进，促进历史逐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把前进过程中某些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把某些消极因素予以化解。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和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唯物史观和我国基本国情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应当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要利用参加世贸组织后的有利条件，主动地走向世界，投入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提高搏风击浪的本领，充分利用一切机遇趋利避害，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处于主动，使社会发展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历史的前进就会缩短同我们奋斗目标的距离，实现崇高理想的目标就会一步一步地接近。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总是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处境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他们这种自发形成的全面依存关系，将会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自觉地对异己力量的控制和驾驭，因此，工人阶级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上述理解，是建立在通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既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又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

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融入”而不“溶化”，“求同”而不“趋同”，要善于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要善于从世界历史进程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到融入世界历史潮流而旗帜鲜明地保持清醒与独立，求同存异而毫不含糊地划清两种制度的区别和界限。

新世纪也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世纪，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在新世纪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也离不开全世界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影响，离不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深刻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现象。它的发展日益深刻地揭示着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内部的相互联系，揭示着其中新的关系、新的规律与新的科学，为人类正确认识大自然，认识物质世界的奥秘，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知识和强大的动力，也为人类打开了更广阔的思路，提供了更深邃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自然应当坚持一贯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密切关注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中吸取智慧，总结经验，从理论上作出符合时代要求、推动时代前进的论断，不断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人类将不断拓展对宇宙空间、海洋、地球深部的研究探索，不断加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加强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和融合，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的研究，也更加需要综合利用世界各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需要彼此的交流、协调与合作，人类终将达到科技成果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坚信，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促进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深化，而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深化，又不断为科学技术的渗透、

融合与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条件，这一发展的大趋势必将成为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主流，即使支流中难免出现曲折、迂回和局部的惊涛骇浪，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类造福、不断提升人类社会水平。科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这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伟事业不可忽视的一个根本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日益提出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从人类的普遍利益和伦理的意义上看，科学技术的成果应当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但是，现实状况却令人忧虑不安，工业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其他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歧视，网络技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企业和个人隐私，克隆技术可能危及人类的秩序和尊严，高技术成果可能成为某些国家谋取霸权的工具，因特网提供的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分，如此等等。人们强烈要求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新世纪，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推动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正确的政策引导，等等，这些也正是唯物史观和人类社会规律在当代条件下提出的时代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也不能忽视上述要求。

当今世界格局的特点是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作为 20 世纪新生的社会制度经受了近百年的历史考验，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近 20 余年重新振兴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并不像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将从地球上消失，而是以它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战胜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如下的特点：第一，社会主义首先是

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建立的，也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发展的，可以说是在忧患中诞生的，有“先天不足”的弱点。第二，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是史无前例的革命。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试验，那是仅仅凭公平、正义、理想的试验，还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科学根据，是终究不能持久的试验，如巴黎公社的试验，那是一次既无坚强领导、又无科学理论的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是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缺少锻炼、表现软弱和过分“仁慈”而导致失败的一次试验。他们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当然也未能给科学社会主义提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20世纪初在俄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无先例可循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有关原则也只是初步的设想和假设，而且多数是从当时西欧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实践和创造，靠经验的积累，其中也靠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其三，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创造过辉煌，有些还是震惊世界的辉煌，这些成就固然使人鼓舞，社会主义成了一时风尚，使人刮目相看，但也使人陶醉，把复杂的问题看得简单化，陷入无所不能、无所不胜、无所不成的不清醒状态，社会主义史上急于求成、轻率过渡、盲目跃进、一步登天、毕其功于一役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其四，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由于胜利自负而产生的主观主义错误和认识上的偏差，往往在不同程度上犯过大体类似的两个错误，一是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二是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盛行的错误，以至对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削弱与破坏。其五，纠正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错误，乃至严重错误和全局性错误，都是依靠执政党本身的力量，依靠恢复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优良作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使中断了的或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以中国的“十年内乱”来说，正确分析这场内乱的性质、错误、原因和

过程，以至具体分析全局性错误中还存在的正确方面，分析“内乱”中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等重要事实，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武器，剖析这场历史事变的结果，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也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依靠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总之，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树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归根到底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起来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历史证明，正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乱而治，扭转乾坤，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同时证明，它自身的存在发展和兴衰成败，都离不开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或世纪的尺度来衡量的时期。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同资本主义相比较中其优越性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而这种优越性主要地不是依靠武力，不是依靠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而是依靠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包括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优秀文明成果，真正做到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并能有所发挥，有所创造。这里有一个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过去我们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相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它们之间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或原始形态的一面，而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和自我调整的一面，很少看到资本主义适应当今世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一面。这样就必然陷入认识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

干不完的事业，学不完的题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宏伟的事业，从创业者毛泽东同志开始，迄今还不足百年，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好的，中国实现了历史的跨越，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在中国这片广袤大地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境界。同过去中国漫长的历史相比，真可谓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但是，同未来要实现的目标相比，同今后要走的路程相比，同前进中的复杂形势、曲折、困难和严峻的挑战相比，那还仅仅是从头开始，刚刚迈上新的征程。

新征程的特点是在更新更高的水平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要在理论上不停顿，做好更为艰巨的理论建设工作。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经历半个世纪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又在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如今要在第三个世纪的百年中同经历更长久、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更高的资本主义制度相竞争，赶上和超过它们，要显示出社会主义真正的优越性，可以说历史发展真正到了“攻坚”的关键时刻。马克思主义必须有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必须有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新理论，必须用创新的理论来指导复杂多变的新的社会实践。我们面临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的历史使命，从跳动的时代脉搏中把握住其中最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早就提出要关注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他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邓小平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89～290页。

平之后，总是站在时代前列，倾听时代呼声，提出时代的口号，引领时代前进。

其一，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态度问题，同新世纪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从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敢于面对未来、开拓创新的大无畏精神，也提出了21世纪新时代的呼声和口号，反映了人民群众昂扬前进的精神状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品质，才能在不断前进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真正做到一脉相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品质，也才能在同实际的紧密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真正以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完全一致的，要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才能在新的时代、新的高度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其二，继邓小平同志成功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继而把目光转向党的整顿和建设以后，鲜明地提出“三个代表”的纲领性论断和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认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和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之后的必然要求和延伸，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又一个基本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这一基本问题而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要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从严治党，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其三，继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科学定位，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后，进一步结合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成就，明确提出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不仅在新世纪之初确定了阶段性的奋斗目标，把初级阶段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了，从而也使我们的崇高理想和党的最高纲领有了坚实的基础，真正落到了实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①他要求全党同志既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用高尚的思想道德来要求和鞭策自己，但不要背离实践的要求去做不切实际的空想，而要脚踏实地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为逐步接近崇高的理想信念铺路搭桥，创造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了新世纪把马克思主义崇高信念同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相结合的奋斗目标，成了时代最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现实任务。尽快让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下是一个多么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啊！

其四，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之路。人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创造历史的主体，没有人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

的全面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不可能实现。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有赖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赖于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充实，有赖于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有赖于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总之有赖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正如江泽民同志从理论上概括的那样：“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①

其五，如何认识当今国内外重大而复杂的实际状况，如何研究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实际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四个“一定”，即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这些变化归结起来就是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根据，也是目前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据。脱离这些重大的实践，离开对这些重大实践的探索，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从党的成立算起，也有80年的历史了，党的十五大已经总结了这段历史，概括了这一辉煌事业的两大理论成果而载入史册。特别令人高兴和鼓舞的是，马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